

从八封信简看耶稣会士入华的最初历程

万 明

明代后期，伴随西方殖民者蜂拥而至亚洲的浪潮，耶稣会士也沿着新开辟的航线踏上走向东方的路程。万历十年（1582）年底，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巴范济来到两广总督所在地肇庆，成为第一批经中国官方允许，在中国内地居留传教的西方传教士。本文谈到的八封信简，是1583——1584年间他们发自中国寄给欧洲耶稣会会长的，其中，四封出自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之手，一封为巴范济（Francesco Pasio）所写，两封是卡普莱勒（Francesco Cabral）的，还有一封是利玛窦（Matteo Ricci）的。原文为意大利文，经教会编辑和删节之后，于1586年发表。笔者所见的英译本，由美国霍华德·林斯特拉编辑并首次英译，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尽管这八封信简并非在当时耶稣会士发自中国的全部信简，且经过欧洲教会编辑出版者的审查和删节，但是，鉴于耶稣会士入华开始时期的中文史料不足的情况，它们毕竟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有助于我们了解作为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开端的这段历史。

一

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西班牙人。他于1542年来到东方，是耶稣会派到东方的第一名代表。在日本的时

候，他发现那里的文化源自中国，认识到中国不仅幅员广大，物产丰富，而且“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日本人，且擅于思考，重视学术。”^①于是决心到中国传教。他提出了教会应派学术修养高深的神父到中国传教的思想，并认为应当觐见中国皇帝，以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然而，1552年，沙勿略到达广东台山县正南海中的上川岛上不久即死于当地。

从那以后，三十年间，西方传教士为进入中国传教进行了种种努力。据不完全统计达五十九次之多。^②葡萄牙人入据澳门以后，耶稣会士也来到澳门。当时，入教者必须全盘葡化，殖民色彩极为浓厚。这种情况，在1578年耶稣会远东教务视察员范礼安（Alexundro Valignani）巡视澳门以后，才开始有改观。他总结以前失败的教训，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认为过去那种传教方式必须改变，进入中国这样一个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历史悠久，有着自身完备的文化和制度的庞大国家进行传教，首先应当会读、会写、会说中国的语言文字，并且采取适应中国习俗的策略，也就是在生活方式等方面变传教士的西方化为中国化，以此争取得到中国官方的承认和接受，最终达到在中国内地传教的目的。为了实施这一策略，罗明坚被选派而来。

罗明坚，意大利那不勒斯人。他在耶稣会士入华的开始时期，曾起过重要作用，堪称利玛窦的先驱。1578年，他从欧洲来到东方，在印度教区渔场进行传教活动。于1579年7月到达澳门，并立即着手学习中国语言，准备实施范礼安传教中国的计划。

二

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正是明朝万历初年。中国社会虽然已经蹒跚地步入封建社会的晚期，但是仍是一个庞大而有力的东方大国。由于肇始于明初的倭寇之患，明朝统治者始终对于“番商”持戒备的态度。正德年间（1506—1521），葡萄牙殖民者在攻占

满刺加（马六甲）之后，曾驾大舶突至广州城下，蛮横地要求朝贡通商。嘉靖时，终于以五百两租银，入居澳门。以后，“雄据海畔若一国然，将吏不肖者反视为外府矣。”^③但葡萄牙人到广州贸易，是受明朝严格规定的：每年两次，不许居住在陆上，只能住在船上。罗明坚在信中亦写道：“因为当地人对待外国人颇多警惕。”^④

耶稣会士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进入中国内地进行传教尝试。他们的策略和步骤很有特点。

（一）首先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了解中国的国情民风

据罗明坚讲述：“我在澳门度过了几年，在那里，葡萄牙人进行贸易活动，而我则学习他们叫做‘官话’的中国语言。这种语言，是中国地方官员和朝臣都使用的。因为这种语言有着几乎无限的词汇，所以学会它是很困难的，即使是中国人自己，也要花费许多年时间。”^⑤刚开始，他遇到了不少困难。不仅缺少教师、语言难度大，而且还受到澳门神学院传教士们的反对，他们认为那是白费时间，所以加以阻挠。但是罗明坚坚持学习不辍，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打下了语言基础。利玛窦于1583年7月抵达澳门后，也经历了刻苦地学习汉语的过程。^⑥他当时撰写的论述中国的文章，是在罗明坚对中国了解的背景下写出的，为范礼安辑入《方济各·沙勿略传》中。

（二）利用初步懂得中文的有利条件，取得明朝官方信任，得到居住广州陆上的许可

罗明坚是借葡商到广州贸易之机，随他们进入广州的。1580至1581年间，他三次去广州。在信中，他记述了首次去广州时，通过几次交谈，博得了一位明朝地方官员的赞许，破格答应了他居住在陆上的要求，给他安排了住处的经历。^⑦罗明坚第二次到广州时，他已学会不少汉字和简单的汉语会话，再次博得明朝地方官员的好感，得到了住进暹罗贡馆的厚待。对此，罗明坚受宠

若惊，因为他知道，几年前为了在澳门的一个中国人皈依了基督教，明朝地方官员曾经颁布过不允许任何神父进入中国内地的禁令。在第三次去广州时，他仍旧住在暹罗贡馆之中。

1582年春，当罗明坚第四次到广州时，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原任两广总督刘尧海离任，新任两广总督陈瑞下令把葡萄牙人赶出中国。为此，召见澳门的葡萄牙行政官和主教。而他们都因害怕失去既得的利益，不敢去见总督。于是范礼安派会讲中文的罗明坚与澳门一个葡萄牙参议一起去两广总督所在地肇庆。当他们谒见总督时，陈瑞曾命令卫队拔剑出鞘，事态危急。由于罗明坚辩解时既冷静，又毫无敌意，渐渐赢得了陈瑞信任。陈瑞转怒为喜，后来不但宴请他们并回赠礼物，甚至留住十五天才让他们回澳门。^⑨

（三）赠送西方新奇物品给明朝地方官员，求得在内地的居留权

罗明坚回澳门后，得了一场病。病中，他托澳门参议代他赠送几副西方眼镜给两广总督陈瑞，并且答应等他病好以后，要送给陈瑞一座制作精美的西洋座钟。于是，1582年12月，罗明坚和巴范济又一次去到肇庆。^⑩ 他们把利玛窦从印度带来的西式自鸣钟送给了总督陈瑞。因为那座钟“设计精巧，而对中国来说是完全新颖的东西，所以陈瑞大为高兴，优礼厚待两名西方传教士。而他们在陈瑞欣喜之余，遂提出了居住在中国内地的申请。陈瑞立即应允并把他们安置在肇庆东关天宁寺。^⑪ 同时还答应了他们让利玛窦也到内地居住的要求。

（四）居住中国内地传教计划的最终实现

罗明坚和巴范济在肇庆的居留是短暂的。不久，两广总督陈瑞因依附权相张居正而被解职，^⑫ 传教士失去保护伞，也不得不返回澳门。此后，巴范济去了日本。新任两广总督郭应聘^⑬ 后在公文档案中发现了颁给传教士的文件副本，下令香山县查清此事。

因此，罗明坚与利玛窦先去香山县交涉，后又到广州活动，但均告失败。在他们返回澳门不到一个星期，事情却发生了突然转机，肇庆知府派人到达澳门，通知传教士到肇庆去，新总督已同意他们居住在内地。^⑭

于是，罗明坚和利玛窦在1583年9月抵达肇庆，受到肇庆知府王泮的接见。两位西方传教士拜见知府时完全按中国礼节行磕头礼，罗明坚用流畅的中国话告诉知府，他们“来自罗马教廷，是由教皇派来的，”提出希望在中国学习语言文字，以便能够和中国人互相交流，分享他们所有的一切^⑮。王泮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同意他们居留传教。同时两广总督批准他们在城中选地建造教堂，地址是在城东崇禧塔附近。^⑯很快，耶稣会中国传教会在华国内地的第一座教堂即拔地而起。

（五）为适应中国习俗而作出努力

传教士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深深感受到不接受中国的文化习俗，他们就无法在中国立足传教。罗明坚在肇庆首先表示愿意顺从总督陈瑞的意思，脱下西式服装，改着中国佛教僧侣的法衣。^⑰这是传教士“除了生理特征以外，完全使自己成为臣属中国皇帝的子民”^⑱而迈出的重要一步。此后，耶稣会士还各自起了中国字号，范礼安字立山，罗明坚字復初，利玛窦字西泰，巴范济字庸乐。^⑲

（六）以学者面貌出现，用西方文化为传教开路

一开始，罗明坚的学者风度与“有学识的名声”很有助于他与中国官员的交往。而西方新奇物品在罗明坚取得中国内地居留权时，已经显示出它的作用。罗明坚和利玛窦在肇庆创办了中国内地第一座教堂以后，特地把他们从西方带来的圣母像，三棱镜、钟表、日晷以及一幅世界地图在教堂内向社会公开展示，以此扩大影响。这些西方新奇物品果然吸引了众多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前往参观。最能引人注意的，是大厅里那一幅世界地图。这

个“世界”，是中国人前所未闻的，所以肇庆知府王泮设想能有一幅译为中文的世界地图。于是利玛窦立即应命用欧洲方式绘制了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王泮见后非常高兴，立刻把它付印了。“他很珍贵它，保存了印板，”计划将地图送给中国那些有地位的人物。”^{②①} 这幅地图无疑非常有效地扩大了天主教传教士的影响。

（七）撰写中文的天主教教理书，通过文字传布宗教

在1584年1月25日的信中，罗明坚写道，他已经完成了用中文编写的《天主圣教实录》，他说那是四年前就开始着手进行的。这部书写成后，他呈送明朝当地官员看过，他们“感到满意”，“已经同意我去出版了”。^{②②} 《天主圣教实录》，是西方传教士用中文撰写的第一部天主教教理书，此书刊刻于万历十二年（1584），秋八月，原本现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关于这部书，利玛窦于信中曾言：它是“通过一位不信教的中国人与一位来自欧洲的神父之间的对话，用基督教最好的方式及其语言文字，驳斥了中国的主要教派。并且附有《天主十诫》、《天主经》和《圣母经》。”^{②③} 这部书的刊刻，证明西方传教士已开始用所学的中文来进行传教活动。开篇《真有一天主章之一》中，有“坚生西国，闻中华盛治，不悼风波，泛海三载，方到明朝。今居于此，非为名利，惟奉祀天主而已。”^{②④} 将来华传教的主旨毫不隐瞒地和盘托出。此书初刻以后，很快就在中国及东南亚传布开来。

（八）从学习汉语文字到研习中国儒家经典

罗明坚和利玛窦到达中国内地居留传教以后，仍“全力致力于学习中文，”罗明坚说：“我们都仍然在学着阅读得更好一些，希望能看懂他们的书籍，以便纠正他们的谬误。”^{②⑤} 他们抱着传布宗教的目的而来，所以学习中文的目的也极明确。传教士很早就已注意到儒家学说在中国的特殊意义，罗明坚在1584年10

月21日的信中写道：“今年有十部关于这个伟大王国的历史书籍从皇城北京运来，这些书是很有权威性的典籍。我们将阅读这些书，并且写出摘要，以便明年送给教长。……我们两人不但已经能够阅读和理解这些著作，而且也可以和一般中国人谈论书中的内容。”^⑤在信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这批典籍的书名，但我们可以从“很有权威性”来推知是一批儒家经典。与儒家经典的接触，无疑是传教士为了传布宗教，寻求中西文化融合的有益开端。后来，罗明坚回到欧洲后，修改出版了他在中国翻译的《大学》的第一部分，成为将中国儒家经典介绍到欧洲的第一人^⑥。而利玛窦在中国的“补儒合儒”更是闻名世界。

综上所述，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是因为他们采用了一种与当时通行的野蛮殖民的传教方式截然不同的学术传教方式，和适应中国习俗的策略。在他们来华的初始阶段，我们已见这种学术传教方式以及适应中国习俗策略的全面铺开。在1588年底，为请求教皇遣使来华，以争取得到明朝皇帝允许，在中国立足传教，罗明坚被范礼安派回欧洲。而适值四位教皇相继去世，请求派使之事因而搁浅，罗明坚本人于1607年终老于故乡意大利。一般所说利玛窦的学术传教方式与适应中国习俗策略，实际上渊源于沙勿略的学术传教思想，范礼安的精心策划，罗明坚的首行实施，是一脉相承下来的。

三

传教士来自西方遥远的国度，当他们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不可避免地要直接接触到中国社会的现实与中国不同的阶层。来华之初，他们所接触到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当传教士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伴随他们进入中国时，中国人的反应又是怎样的呢？从传教士当时的信简中，我们也可略知一二。

人们是通过语言、思想、感情等反应，彼此影响对方，同时

也受对方的影响的。罗明坚首次由澳门到广州，因为他会讲一点中文，态度彬彬有礼，所以很快“得到一位当地官员的喜欢，”那一官员“很赞许，也很和善地”安排他居住在陆上一所小房子里，并且以自己的权力“用处以死刑来威胁当地人，”使他们不得伤害罗明坚。西方传教士的古怪行为和奇异的相貌使他在无疑是非常显眼的，当时，日日夜夜都有众多的中国人去观看罗明坚，甚至有人在墙上打开一个洞。一次，有个中国人从洞进入房子，然后打破自己的头，声称是传教士打的，以激起人们反对传教士。但经当地那位官员问讯，从相信传教士而了结此案。接着罗明坚在那所小房子里居住了三个月，与当地一些官吏多有往还。罗明坚甚至提到，一些官员和衙门里的人去访问他，还曾“问了许多问题，来了解我们的教义。”^{②7}值得注意的是，罗明坚在那所房子里曾公开为葡萄牙人做弥撒，明朝官方丝毫没有禁止。

在罗明坚第二次到广州时，住进了暹罗贡馆。由于当地高级官员对他“抱有好感，”因此其他官员对他“也很友善。”罗明坚讲道：“他们之中有一位是军队里的将军，我赠给他一块钟表，他甚至提出，想把我带到更远的内地去。”^{②8}

两广总督陈瑞对澳门葡萄牙人及西方传教士本抱有一定戒心和敌意，但在召见罗明坚后，态度明显转变。过去，往往认为陈瑞允许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居留传教，是因为传教士给“老而弥贪”的陈瑞大加贿赂的结果。当然，贿赂是一个方面，然而，还应当注意到，如信简中所表明的另一个方面，即陈瑞为传教士“学过并懂得数学，还能够制造精巧的东西——象日晷和其它地球仪一类的东西而感到满意。”对此，他甚至说：“他感到以这样的智慧服务于上帝，是件十分美妙的事。”还说：“准许对公众有益的人们居住在这里（指肇庆），是适宜的。”^{②9}明末，总督在地方上是最高官员，拥有很大权力，因此，传教士在

得到陈瑞认可后，实际上是合法地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了。从西方传教士获准进入中国内地居留传教一事，我们可以窥见异质文化吸引的力量。

由于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传布的天主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前所未闻的，所以，从明朝地方大员到士绅百姓，对这种外来的宗教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加之西方传教士的相貌在中国人看来很是奇特，加之他们又来自遥远的西方，这些都为其宗教学说更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正如佛教初入中国，人们把它看作神仙方术一类那样，陈瑞有一次问起罗明坚和巴范济，他们怕不怕魔鬼，会不会驱魔。传教士回答说，他们不怕魔鬼，因为有上帝的威力，魔鬼就吓跑了。^③这种回答无疑会使陈瑞产生他们是有驱魔法术的想法，更将他们看作奇特的人。

最初与西方传教士交往的明朝地方官员中，比较突出的是肇庆知府王泮。王泮，字宗鲁，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嘉靖进士，万历八年（1580）为肇庆知府。十二年迁按察司副使，分巡岭西，亦治肇庆。史称他“慈爱和易，士民见者语次寻绎甚有恩惠，未尝疾言遽色于人，而确然有执，虽门生故交无私也。好为民兴利，兴学校……性恬谈，自奉如寒士，居官廉洁，焚香静坐，若禅室。然诗词冲雅，书法遒丽，有其家右丞右军之致，粤中文士皆来就正。而郡中子弟又时以举业请，则择程式示之，如群饮于河，各厌其腹矣。十六年迁湖广参政，高要士民遮留泣下，建祠事之。高明亦有祠。”^④这位科举出身而又居官廉洁的明朝地方官员，对于西方传教士的态度，很能说明明朝后期中国士大夫阶层对传教士最初的认识和看法。王泮在罗明坚和利玛窦到达肇庆后接见他们，倾听了他们所述来华缘由后，不但帮助他们落脚于城东崇禧塔附近，而且还帮助他们建造起住宅以及中国内地第一座天主教堂，又亲笔题写了两块匾额送给传教士，罗明坚把其中一块放在住宅门上方，另一块放在教堂中。两块匾额上

的题字是“仙花寺”、“西方净土。”在罗明坚的信中，提到王泮同时还送给他一首诗，他把这首诗译成意大利文附在信里，现中译如下：

谨献歌句给西国天人。
他从遥远的西方王国乘坐小船，
航行万里，穿越辽阔的海洋。
来到著名的与外界隔绝的中国，
留在那里，成为一名圣人。
在寂静的夜里，一条龙潜入湖中，
溅起周围浪花，腾向夜空。
春天来临，一只候鸟飞入树林与绿地。
在这里，他忘掉自身和一切，
是否还忆起亲爱的故乡？
他心中明晰，独自向神倾吐祈求，阅读典籍。
他来访问这在中央的统治地，
引导人们为自己准备天堂之路。
具有坚强果敢头脑的人十分罕见，
他散布馨香，既广且阔。②

可惜的是，这首诗现仅存于罗明坚信中，无法与原作对照。方豪先生曾对明末清初来华西方传教士与士大夫的交往做过专门研究，对双方馈赠方物，互通书信、题作诗词等详加考证，然而，他没有提及这首诗。由罗明坚的译诗，我们可以了解到，王泮对于罗明坚等传教士从遥远的西方来到中国，是为了传布宗教这一点，是笃信不疑的，而且就其所能理解的，进行了赞颂。由此可知，有人认为传教士一直隐瞒来华的真实意图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明朝士大夫将传教士看作远来的西方僧侣，“盖大西诸儒来自九万里而遥，并无别图，特为传教，必有至正至深之理寓其中为可察焉。”③这很能代表他们当时的一种心态。

从耶稣会士的信札来看，在其入华的初始时期，明朝地方官员把基督教看作一种新奇的外来宗教，把传教士称作西方僧侣，认识是明确的。但从两广总督陈瑞开始，为了避免准许外国人入境传教为人指摘，招来嫌疑。便让传教士改穿中国的僧装且居住在佛教寺庙中。耶稣会士把佛教徒称作偶像崇拜者，他们对佛教僧侣在中国的地位低下已有所了解，这从1584年12月卡普莱勒的一封信中即可得知：“对那些长老，一般人是并不尊敬的^④。”但由于传教士进入内地时间短，立足尚不能称稳定，为避免嫌疑，只得以僧服打扮，而以西方学者面貌与士大夫周旋，等待时机成熟以改善身份。后来利玛窦报经罗马教会批准，在韶州改着儒服，为跻身中国士大夫行列，又前进了一步。

两广总督全称总督两广军务兼理粮饷带管盐法，职权并重。按照惯例，其属下所有地方官员到任和离任都要去拜见，在任期间更是往来频繁，所谓“肇庆幕府所治，两粤藩臬使者若四方之宾，无日不至。”传教士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教堂里陈列西方带来的新奇器物，供人观赏。作为西方艺术及科学技术的象征，它们很能吸引中国人。当年，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传入中国时，经典的作用远不及它的艺术——佛像来得那么形象，生动，耶稣会士初入内地传布基督教，也是依靠圣母像、圣物，以及教法的漂亮的装裱艺术吸引中国人。而他们明智地向中国展示了许多西方科技的奇器，如日晷、地球仪、三棱镜、世界地图等，这无疑博得了更多中国人的好感。传教士在信中写道，那些到肇庆去的官员们“通常都要来到我们的住处，观赏那些新奇的东西，”以这样的方式，传教士们“有机会去接近他们，以便交流感情。”于是，传教士们的名声“已经传布到中国的更广阔的地方。”^⑤

由于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得之不易，传教士一开始是很谨慎小心的。罗明坚在信中说：“和中国人相处，需要有极大的机敏和文雅，决不能不明智地急于进取。否则，很容易使上帝已为我们

打开的大门关闭起来，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门才能重新打开。”^{③⑥}虽然大批中国官员士大夫公开到教堂，“来瞻仰神圣的画像，问及基督教教义和用圣水洗去罪孽的事情，”但是，传教士并没有急于发展教徒。1584年年底，澳门神学院院长，当时作为耶稣会中国传教团监督的卡普莱勒得到王泮的 特许，抵达肇庆。他在肇庆的短暂居留期间，给两名中国人施行了洗礼。据其信中所述，其中一人是一名秀才，颇有学问，他准备去北京寻求一官半职。他在传教士那里住了四、五个月，帮助罗明坚翻译和抄写基督教经典教义，这使他成为最早接触并皈依基督教的人。西方传教士给他取名保禄。而另一个人，卡普莱勒写道：“是个已婚的人，取名若望。他曾是第一个在自己家里接待我们神父的人，曾有机会进行过基督教教义的学习。”^{③⑦}对于传教士在肇庆公开施行洗礼仪式，发展天主教徒一事，在城里并没有引起反对。卡普莱勒接着说明，当地官员们没有认为是不好的事而加以反对和禁止，相反的，在听说“高贵而有学识的保禄已成为一名天主教徒以后，城里一些有地位的人物都来向他表示祝贺。”而保禄在接受洗礼的第二天，告诉到传教士们，“他住的那条街上所有的人全被感动了，都想要成为教徒，并且完全了解他所做的一切。”^{③⑧}这一说法恐怕带有夸张，当时还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完全了解”接受洗礼这件事。而此事在肇庆城中会带来一定的反响，却是必然的。已成为天主教徒的保禄，打算在北上北京的途中回福建老家停留，他带走一些印好的《天主圣教实录》，以影响他的妻儿入教。这是明末耶稣会传教影响开始进入福建的踪迹。在明朝地方官员的准许与保护下，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传教活动得以顺利开展起来。由于西方传教士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社会的特点，认识到明代的士大夫阶层，是当时社会相当特殊的一个阶层，也是他们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必须打通的阶层。因此，耶稣会士千方百计迎合士大夫的心理，接近他们，熟悉他们，和

他们交朋友，用他们所习惯的方式去交流思想感情，利用西方文化的魅力博得好感，渐渐为明朝地方大员以至整个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在中国内地开展传教活动，扩大社会影响。罗明坚首次到广州，受到官方保护，他说：“普通百姓也都尊敬我。”在官方同意拨地给传教士建造住宅和教堂之时，地方上马上有人借给他们一笔数目不小的钱以供建造之需。卡普莱勒写道：“一些有地位的人都来祝贺我们，因此，一般老百姓不敢怠慢我们。”这些说明在官方认可的情况下，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已为地方社会作为宗教僧侣而接受。

然而，在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的初始阶段，百姓中业已有人加以排斥和反对，这也是事实。如前所述，罗明坚在广州第一次居住期间，就有人故意打破自己的头来激起人们反对罗明坚。而后来在肇庆建造住宅和教堂时，当地百姓因房子座落在崇禧塔附近，怕冲了风水，所以想把“蕃鬼”赶走，于是从塔上不断地向教堂投掷石头。利玛窦自己曾明言：“肇庆市民有自己的特殊理由仇视外国人。他们害怕葡萄牙商人会随传教士深入内地，而这种恐惧是不无根据的。神父们常去澳门城，他们和长官越来越亲密，这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反感。”^③虽然崇禧塔一案由官方出面通告，申明传教士是为总督所批准居留传教，严禁对他们无礼的事情再次发生，但是这一事件却反映出肇庆部分百姓对传教士的态度。

罗明坚在《天主圣教实录·引》中言道：“尝谓五常之序，仁义最先，故五伦之内，君亲至重……今蒙给地柔远，是即罔极之恩将何以报，惟以天主行实原于西国，流布四方，得以救拔灵魂升天堂，免坠地狱。姑述实录，译成唐字，略酬柔远之恩于万一云尔。”^④西方传教士进得中国的大门来，获准在肇庆居留传教不过将近一年，他们已经开始结合中国封建伦常，以报恩为名，传布天主教了。而此时宽容地接纳了他们的中国人一方面为他们

所带来的西方文化魅力所深深吸引，另一方面却又对他们所信仰并传布的宗教尚知之甚少，这便是耶稣会士入华初始阶段的特征。

注：

①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方济各·沙勿略传》引沙勿略遗札。第60页。

②C.E.Ronan ed, *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 in China 1582—1773*. P. 30.

③光绪《香山县志》卷二二。

④⑤⑦⑨⑩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M.Howard Rienstra editor and translator, *Jesuit Letters From China 1583—1584*, P16, 15, 16, 17, 18, 21, 25, 22, 24, 19, 24, 16, 17, 19, 18, 23, 26, 28, 21, 27, 27.

⑥George H.Dunne, *Generation of Giants*. P25—26.

⑧⑫《明神宗实录》卷一一八，万历九年十一月戊辰；卷一三二，十一年正月壬戌。

⑪⑬光绪《肇庆府志》卷八《古迹》，卷十二《职官》。

⑭⑳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第157页，175页。

⑯道光《高要县志》卷十五《古迹》：“崇禧塔在城东小市顶。”

⑰裴化行著，王昌社译《利玛窦司铎和当代中国社会》第一册，第75页。

⑱Nigel Cameron, *Barbarians and Mandarins*. P156.

⑲德礼贤编，方豪译《利玛窦年谱》。

㉑㉒罗明坚《天主圣教实录》，见《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第二册。

㉓D.E.Mungello ed, *China Mission Studies (1500—1800)* Bulletin I. P4.

㉔焦竑《国朝献征录》卷八八《参政王公泮传》。

㉕《圣教信证·韩霖叙》。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本文责任编辑：袁俐)